

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

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上海戏曲迎来姹紫嫣红的新时代

新中国成立后,70年继续开来,上海戏曲界的艺术家们站在人民的舞台上,为人民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大戏,在剧种改革、剧目创作、表演艺术、戏曲人才培养等方面,呈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丰富的剧种滋养着上海的艺术气息,满足着这座城市文化需求,而各剧种的艺术家们也在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的影响下,一次次激活了传统戏曲,并拓展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版图。尤其是近五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,传统戏曲已形成良性发展的机制,上海戏曲人更是迎来了新时代的姹紫嫣红,上海也越来越成为好戏的源头和戏曲传播的码头。

■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

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戏曲的生存与发展状况,直接折射了传统文化价值有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认同。上海戏曲素有中国戏曲“半壁江山”之称,在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中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:多个剧种在这里交融发展——京剧在上海获得命名;昆曲在上海培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专业演员;江南发端的越剧、淮剧在上海发祥;评弹的姑苏的调透过上海电台飞入寻常百姓之家;而作为上海本土的沪剧更是成为被其他剧种广为移植改编的对象。

一批名家在此开宗立派——不仅有周信芳的“麒派”、盖叫天的“盖派”,越剧、评弹的绝大多数流派创始人也在上海;“传字辈”老艺人则将昆曲从一度濒临的生死线拉回时代洪流。

一批知名剧种确立了上海“戏码头”这一全国性的市场地位——光是人民广场这一路程不过15分钟的区域,就有天蟾逸夫舞台为代表的“四大京剧舞台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70年继续开来,上海戏曲界的艺术家们站在人民的舞台上,为人民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大戏,在剧种改革、剧目创作、表演艺术、戏曲人才培养等方面,呈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丰富的剧种滋养着上海的艺术气息,满足着这座城市文化需求,而各剧种的艺术家们也在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的影响下,一次次激活了传统戏曲,并拓展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版图。

尤其是近五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,传统戏曲已形成良性发展的机制,上海戏曲人更是迎来了新时代的姹紫嫣红,上海也越来越成为好戏的源头和戏曲传播的码头。

新中国改天换地

戏曲人找到了为人民创作的奋斗目标

得益于丰富的积累、活跃的市场与开放的环境,上世纪20、30年代的上海就是梨园人名唱红必须闯一闯的“码头”,集纳京昆与一众地方剧种在此汇聚交融。也是在这里,梅兰芳、周信芳、袁雪芬等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进步戏曲人,为抗日救亡、争取民族解放而创作演出京剧《生死恨》《文天祥》、越剧《祥林嫂》等激起民众爱国激情与自强不息意识的作品。

然而,在1949年前,戏曲艺人总体上始终游走于社会边缘。是新中国的成立,给梨园带来了改天换地的变化。正如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和高兰英所说,最振奋莫过于成为剧团和舞台的主人,彻底摆脱戏班班主、剧院老板的压榨和欺凌,票房取得票房演出溢价码的陋习,找到了为人民演戏、为人民创作的奋斗目标。比如越剧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“姐妹班”制度,以才艺人股,按劳所得。1955年多家越剧团进一步整合为国有文艺院团上海越剧院,在首任院长袁雪芬的带领下,上世纪40年代自发以“越剧十姐妹”争取不命运的江南女子,在国有文艺院团的保障之下,从制度上确立了戏曲人的艺术尊严和权益,这大大激发了他们在台前幕后为剧种发展做贡献的积极性,也让越剧的“十大流派”独在上海得以绵延传承。

立志而坚则实。戏曲人在党的感召下,不再用低俗媚俗迎合市场,而是紧贴现实、紧贴生活,创作出更多与时代脉搏共振、与国家人民命运相连作品。从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获奖名单来看,上海名家新作就已经硕果丰厚。七位获奖获得者中上海艺术家周信芳、袁雪芬、盖叫天名列其中;越剧

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沪剧《罗汉钱》,淮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拿下剧本奖,此外昆曲、越剧、沪剧、淮剧的演出演员悉数获奖。正是这一批名家新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为上海戏曲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“穿林海,跨雪原,气冲霄汉”,《林海雪原》里的豪情以西皮二黄传遍大江南北,上海京剧院用1958年创排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回应了传统戏曲的现代戏创作课题;一甲子后,这出京剧的保留剧目已传至第七代。同年,丁是斌、解洪元、邵滨滨、王鑫声等排演的沪剧《芦花火种》(《红灯记》)则被京剧等剧种广为移植。这些剧目在接力传承与移植改编中,也沉淀为上海红色文化资源。在建设祖国、人民自强不息的一线,也少不了戏曲人深入生活、为人民创作的身影。1952年,上海人民评弹工作组(上海评弹团)的18位评弹艺人亲身参与治淮,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零二十天,集体创作出中篇评弹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》,不仅在题材上拓展了说书先生的格局与视野,更从形式上以“中篇评弹”创新,让评弹走出书场登上舞台,争取更多观众。

与此同时,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,上海戏曲开始拓展自己的传播半径。1958年2月,由徐玉兰、王文娟主演的越剧《红楼梦》首演于上海共舞台,后赴广州演出,所到之处广受欢迎。1962年,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其拍摄成彩色影片,由岑范导演,徐进编剧,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,首轮连续放映38天,400余场,观众近40万人次。之后该片在全国放映,立刻风靡,成为同名原著的视听普及版,一时家喻户晓户晓。

改革开放大潮兴起 新一代戏曲人支撑起上海戏曲第二春

戏曲的传承,离不开几代表演艺术家的坚持与贡献。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,一批中青年戏曲人继承解放初期老艺术家的传统,薪火相传以人带戏,以戏托人,开拓创新,成为上海戏曲界的中流砥柱,支撑起了上海戏曲的第二春。

上海昆剧团于1978年在绍兴路9号正式成立,其演员中力量,正是蔡正仁、岳美莲、张海滨、计镇华等“昆大班”学员。在《十五贯》一戏救活一个剧种“佳话”传扬两年前,上海就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,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昆曲专业人才培养的起点。他们皆由俞振飞、言慧珠和“传”字辈艺术家为代表性的一批老艺术家口传身教悉心培育而来。一甲子的时光过去,这批昆曲“国宝级”老艺术家不仅带出了谷好好、沈昀昀、张军、黎安、吴双等撑起今天上海昆曲发展的“昆三班”,更毫无门户之见,为全国现有的八大昆曲院团新生力量树立典范,令昆曲舞台呈现“五代同堂”的繁茂景象。

沪剧同样如此。1979年,上海沪剧团推出新戏《泪血樱花》,刚刚担任团长的丁是斌正处艺术盛年,却主动提出让年轻演员陈瑜担任主演;1981年,她又用《一个明星的遭遇》推出了当时刚刚19岁的新人李善玉。1982年,上海沪剧团排演根据曹禺名著改编的作品《日出》,丁是斌点名马莉莉出演陈白露。2002年,李善玉成为沪剧院掌门人,上任后抓的一件大事就是人才培养。2006年,上海沪剧院联合上海戏曲学校,招收了28名沪剧表演班的学生。2010年,这批学生毕业后,成立了上海沪剧院青年团,通过悉心栽培,几年后就能独立主演《陆雅臣卖娘子》(《大雷雨》《芦荡火种》)等大剧。

台上人才不断档,幕后创作家罗怀臻、李莉也从上海戏剧学院走出,将现代戏剧理念融入传统戏曲创作,进而有了淮剧《金



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:

- 1954年,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由上海越剧院院长、袁雪芬搭档袁雪芬和范派创始人范瑞娟出演。
- 1962年拍摄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自推出以来数十年间在全国引发广泛反响。图为《红楼梦·读西厢》中徐玉兰(左)饰贾宝玉,王文娟饰林黛玉。
- 30年来,《曹杨与杨修》作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兰英的代表作之一,受到业界的肯定与观众的认可。

2016年时值汤显祖逝世400周年,上海昆剧团推出“临川四梦”,四台大戏唱进了国内外高校;唱进了现代化一流剧场;唱到了海外顶尖艺术节与文化地标。

龙与蚌蚶》,京剧《成败萧何》这样具有时代意识的新编历史剧。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。传承好丰厚家底之余,上海更为全国优质人才敞开了大门。无论在哪个场合,高兰英都会讲起他带着《曹杨与杨修》的书稿,听着贝多芬《命运》叩开上海交响乐团大门的故事。与剧中曹操好名士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,是上海文艺界对于优质人才、潜力作品的“青眼相待”,这才有了此后好戏《贞观盛事》《廉吏于成龙》的接二连三。“麒派”老生陈少云更是寻着流派创始人周信芳步伐,自南落户上海,《狸猫换太子》《成败萧何》同样产生广泛影响力。

相应的,上海加大了对戏曲创作的资金扶持力度,为戏曲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方新的舞台。首届“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”应运而生,近四分之一戏曲演员入选,多管齐下创造戏曲在上海发展的良好生态。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六家国有文艺院团均参与到“一团一策”改革之中,以“学馆制”“艺委会”“制作人制”等体制改革创新推动出人出戏出影响力。

文艺院团改革激活市场一池春水,戏曲人不仅深耕本土市场,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、演出品牌打造等多方面,在全国乃至世界拓展影响版图。

上海京剧院的名角通过国有文艺院团与社会力量的结合,让海派京剧线上“圈粉”年轻人,线下漂洋过海展国粹之美;史依弘将传统戏《霸王别姬》带到普林斯顿大学,也受邀亮相纽约大都会博物馆,并陆续推出“梅尚程荀史依弘”等多个演出品牌;王珮瑜将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与京剧漫画的传播相结合,为京剧成功“圈粉”大量年轻观众;严庆谷的“大圣戏”不仅在日本中小学戏曲普及教育领域颇受欢迎,还于今年6月在日本创造商业演出多场“满员御(售罄致歉)礼”的票房佳绩。

上海昆剧团则把握时机,打造“临川四梦”、四本《长生殿》等巡演项目。2016年时值汤显祖逝世400周年,上海昆剧团先后六家国有文艺院团均参与到“一团一策”改革之中,以“学馆制”“艺委会”“制作人制”等体制改革创新推动出人出戏出影响力。

文艺院团改革激活市场一池春水,戏曲人不仅深耕本土市场,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、演出品牌打造等多方面,在全国乃至世界拓展影响版图。

新时代东风浩荡 海派戏曲在世界舞台获得共鸣

百年来南方“戏码头”的滋养积淀,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坚守传承,戏曲人于2014年迎来厚积薄发的转折点。这一

《一个明星的遭遇》

主演:李善玉
《一个明星的遭遇》由上海沪剧团于1981年4月首演,讲述了歌舞团演员周璇的坎坷经历,1982年由余雅和编剧为电视剧连续剧《璇子》,并沪剧电视剧连续剧之先河。



《长生殿》

主演:蔡正仁 张静娴
2007年,上海昆剧团推出全本《长生殿》,结束了300余年该剧没有全本演出记的历史。其后又推出了精华版。自2007年以来,该剧拿下了戏曲奖项“大满贯”。



《雷雨》

主演:李善玉
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沪剧《雷雨》,是上海沪剧院的保留剧目,历经几代传承。2013年,李善玉凭借该剧摘得“二度梅”。



《贵妃醉酒》

主演:史依弘
上海京剧院近些年在致力于创作新作品的同时,注重对老戏的传承,常年策划演出季为戏迷奉上传统经典。因为2013年《贵妃醉酒》演出照。



《霸王别姬》

主演:高兰英 史依弘
高兰英与史依弘主演的《霸王别姬》不仅被拍摄成3D全景声京剧电影,2014年首映并获得海内外电影奖项,也在英国高校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演出。



《西厢记》

主演:钱惠丽 方亚芬
作为上海越剧院的四大经典保留剧目之一,以其诗化的舞台呈现被誉为最忠于王安寿原作的当代作品之一。2015年启动拍摄的《西厢记》也是首部越剧3D电影。



口述实录

戏曲人的“初心”就是为人民演好戏

王文娟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,我早已爱上了这个人物。为了演好这个人物,在排演前我早早找来原稿仔细阅读,对有关章节和研究文章更是反复地读。在创作人物形象时,我还仔细观察了古代仕女图,从中寻找可供借鉴的形象素材。此外,我也用心地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情感体验。

此后在舞台表演上,我也创新杂糅越剧不少表演手段,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。最为观众熟知的《铸剑》中,我为林黛玉设计了一系列动作。比如在焚诗稿、焚诗帕一场,林黛玉听闻外面的鼓乐之声,想踮脚出门但已卷卷一息。所以,我在演这段时用力了一点脚步,跌跌撞撞向外冲,表现出林黛玉在极度绝望中对封建礼教的控诉与抗争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,我进入上海越剧院工作,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《红楼梦》,我饰演的林黛玉成为最为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角色。全国很多原来并不了解沪剧的观众正是因为看了《红楼梦》而开始爱上越剧。尽管我从小就学戏,但总感到自己文化底蕴不够,为了吃透这部经典,呈现给观众最好的一面,我做了很多努力,包括阅读原著、分析人物等。

《红楼梦》的点点滴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——这不仅是因为我在演出《红楼

梦》前,编编剧徐进立下了“军令状”;更因为随着学习表演的不断深入,我早已爱上了这个人物。为了演好这个人物,在排演前我早早找来原稿仔细阅读,对有关章节和研究文章更是反复地读。在创作人物形象时,我还仔细观察了古代仕女图,从中寻找可供借鉴的形象素材。此外,我也用心地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情感体验。

此后在舞台表演上,我也创新杂糅越剧不少表演手段,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。最为观众熟知的《铸剑》中,我为林黛玉设计了一系列动作。比如在焚诗稿、焚诗帕一场,林黛玉听闻外面的鼓乐之声,想踮脚出门但已卷卷一息。所以,我在演这段时用力了一点脚步,跌跌撞撞向外冲,表现出林黛玉在极度绝望中对封建礼教的控诉与抗争。

回头看,经典作品绝不是一蹴而就的,《红楼梦》就是在集体努力下不断精益求精的结果。过去我每次演《红楼梦》,编导都会坐在剧场和观众一起看戏,观察他的反应,也把演出中出现的即时记录下来。谢幕散场后,导演会立即召集全体演职人员进行开评会。这样一来,演

我是一个超龄服役的“戏曲老兵”

尚长荣

我是一个超龄服役的“戏曲老兵”,出生于1940年。1949年1月,北平和平解放。第一时间,党和政府就为梨园人士专门举办了三期戏曲讲习班。这对于梨园行来说,是闻所未闻所未见的新闻事。家父(尚小云)听说,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。除了父亲,大哥、二哥也参加了这班课,连着两期,每次学完回家,父亲和两位哥哥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、同行们分享。

受讲习班的影响,父亲于1949年11月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尚小云剧团,稍后“潜入”上海,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我是个幸运者,赶上了好时代,赶上了好政策,赶上了好团队,也赶上了最好的观众。到了上海,大家一搭即合,这才有了《曹杨与杨修》的成功。

从小,我就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演员。我总忘不了《铸剑》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里保尔·柯察金的那句话:“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”要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戏曲人,就必须闯一闯,养尊处优、墨守成规是没有前途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还服务于陕西晋京剧院的我发现了《曹杨与杨修》的剧本,有了排演的想法。但对当时的陕西省京剧院来说似乎有点吃力,于是我选择来上海。尽管当时我在上海毫无亲友,但我觉得这座城市极富创新、求新以及锐意进取的精神。这种精神激励着我,吸引着我。还记得当时我带着剧本,听着贝多芬的《命运》就敲开了门。恍惚间我甚至在想,这究竟是戏曲融入时代的“命运”,还是我个人命运前途的“命运”?就这样,我坐着绿皮火车,悄悄“潜入”上海,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我是个幸运者,赶上了好时代,赶上了好政策,赶上了好团队,也赶上了最好的观众。到了上海,大家一搭即合,这才有了《曹杨与杨修》的成功。

从小,我就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演员。我总忘不了《铸剑》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里保尔·柯察金的那句话:“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”要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戏曲人,就必须闯一闯,养尊处优、墨守成规是没有前途的。

此后在上海京剧院的十多年间,我又